

新城子文史资料

第一辑

政协沈阳市新城子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三月

前 言

《新城子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在中共新城子区委的关怀下，在区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现已正式出版，这是我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晶，是区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工作一个新的突破。

文史资料是以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对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实录，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和可读性。文史资料工作，是二十九年前的周恩来总理倡导的，是历史史实的真实记录，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史资料工作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采取“质疑、补充、订正”等办法，以保证史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新城子文史资料》是以刊登本地区的史料为主，长期征集，陆续出版。从而积累和保存历史资料，继承发扬祖国文化遗产，惠及子孙后代，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

新城子地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往今来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和英雄业绩；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伏史丰富；知名人士、仁人志士荟萃，蕴藏着丰富的史料。我们诚挚地欢迎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关心我区的

文史资料工作，】并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实撰写成稿件寄给我们或通知我们去采访，为抢救我区近百年来的各种史料做出贡献，我们将不胜感激之至。

在本刊出版之即，对给本刊支持的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以及区委、区政府的有关部门，深表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界人士和读者，给以赐教，以便改进。

政协沈阳市新城子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征编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目 录

-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一段回顾……………刘达生（ 1 ）
- 二、马刚烈士传略……………赵荆山（ 4 ）
- 三、七星山下巨变……………贾秀武（ 7 ）
- 四、新台子“清真寺”……………周绍昌（ 13 ）
- 五、辉土岗子千佛寺……………于海琛（ 16 ）
- 六、漫话新城子区锡伯族……………于海琛（ 21 ）
- 七、反动地主武装“东大会”覆灭记……………李宗顺（ 27 ）
- 八、伪满时期的“开拓团”……………赵文章（ 31 ）
- 九、在财落堡公安局工作的回忆……………王者师（ 33 ）
- 十、蔡台子中学片断……………李宗顺 沈翠杰（ 37 ）
- 十一、豫庆增油坊……………陈敬师 于海琛（ 42 ）
- 十二、民国、日伪时期新城子站主要商号、店铺统计表……………姚志远 范传学 程延玉 口述整理（ 49 ）

关于西安事变的一段回顾

刘达生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五十周年了。当年的少帅，风流倜傥的张学良将军的形象一幕幕的呈现在我的面前。一九三六年，我是东北军一〇五师第九团六连的连长，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文很要好。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将军和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的时候，是我率领士兵担任警戒，为他们站了一夜岗，直到翌日拂晓他们才分手。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全中国。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潮不断高涨，而蒋介石搞不抵抗主义，还搞什么“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密令东北军撤向关内。东北军撤到关内又被蒋介石调到西安打内战，和红军在大小劳山、洛川等地打了几仗，都惨遭失败。张学良将军面对日寇入侵，内战迭起，心情十分沉重，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使人民免遭涂炭。为了实现他的愿望，他曾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给东北军受训军官们讲话，曾在蒋介石五十寿辰时，说服他改变违反全国人民意志的“安内攘外”的政策，停止国内战争。但蒋介石“固执已见”不听劝说。蒋介石对东北军也是冷眼相待，东北军撤到关内后，曾四个月不给发军晌。张学良将军为了抗日，从洛阳回到西安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出了东北军盼望国军收复东北的强烈愿望。而蒋

~ 1 ~

介石却执迷不悟，不久来到西安，到了“王曲”镇，召集在此受训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所有的军官，重申了他的“安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当时我正在训练团受训。张学良看透了蒋介石真面目，并在三天晚上召开“王曲”受训团东北军军官的主要领导人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说：“大家要明白，蒋介石今天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安下心来，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一次来到西安，命令张学良、杨虎城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张、杨二将军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十二月十五日张学良用自乘的飞机到陕北接来了周恩来，共同争取蒋介石抗日，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抗日的主张，接受了和平条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乘机夺取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向日本妥协。汉奸汪精卫在德国得知消息也急于回国，国内局势日趋恶化。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定把蒋介石释放回南京，张学良及时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极为沉痛地说：“我为什么把委员长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不尽快地把他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正是国家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张学良将军事先没有和杨虎城将军商量，也没有通知周恩来同志，就秘密的将蒋介石用汽车送往西郊机场，乘飞机回到了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但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却被背信弃义的蒋

介石囚禁了，直至今日，在囚禁中断送了他一身才华。

从西安事变可以看出，张将军是不遗余力，不怕风险，为国为民，为了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做出最大的个人牺牲。

马刚烈士传略

赵荆山

马刚，原名马吉瑞，河北省安国县西伯章村人，生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幼年的马刚，全家八口人，只靠父亲织土布糊口度日。由于家境贫寒，他断断续续念了不到三年书，就被迫辍学了。十三岁那年，他不得不到离家二十多里的门东村给一个富农当了长工。

一九三七年，门东村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马刚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反抗地主富农的斗争。在斗争中，他逐步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革命道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经刘者彬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以后，马刚先后担任了西伯章村地下公安员和安国县第三区工会主任等职。当时，西伯章村设有日寇的中心点碉，是敌人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马刚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带领民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把自己家作为抗战的“堡垒户”，密切监视着敌人的动向。为了骚扰打击敌人，他经常带领民兵夜间出击，多次在安国到博野之间埋地雷、炸碉堡，割断敌人电线，阻截敌人交通，使敌人不得安宁。他还曾经在西佛落村区办的小兵工厂里，组织民兵制土枪、造土炮，为埋葬日寇创造条件。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后，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抽调一批干部北上，开辟建设东北地区。马刚怀着解放东北，

建设东北的强烈愿望，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徒步来到沈阳。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马刚被中共沈阳市委分配到沈北蒲河区工作。当时蒲河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东大会”和“西大会”，也叫东大团、西大团，到处抢男霸女，收租逼债，做恶多端，民愤极大。这些反动武装不彻底摧毁，我党我军就很难在这里站住脚、扎下根。他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同我三五九旅保安三旅仅用二、三天时间就把东、西大会全部消灭，为广大贫苦农民报了仇，出了气。

十一月底，马刚奉命到刘千户分区担任分区委书记兼区长。他在蒲河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不到一个月就建立了以陈子良、戴巨贤、王尚林等贫苦农民为核心的政权组织——清算委员会。马刚领导清算委员会，发动广大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斗争。在强大的革命攻势下，董佐辰、关成志等三十多户地主富农乖乖地接受了我党“二五”减租政策，开仓济贫，有一百多户穷苦百姓第一次分得了胜利果实。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翌年二月，马刚亲手组建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区小队（由二十人发展到六十多人）。区小队遵照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在刘千户山区一带机动灵活地袭击和牵制敌人，使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三月的一个凌晨，国民党二〇七师部队的数百名匪兵，突然向我在刘千户的蒲河区中队和刘千户区小队进行猖狂反扑，机枪不停地向村内射击。在敌众我寡战势不利的情况下，马刚首当其冲，迎险而上，只身和敌人周旋，掩护队伍安全突围，使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没有受到损失。不久，刘千户区小队被编为沈铁抚联

合县第六中队，马刚担任指导员，继续领导第六中队和当地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马刚率第六中队部分同志转移到后腰堡的自然村二道沟夜宿。中队内部高俊清、马仲书等动摇叛变。次日早六时许，部队将要整装待发时，叛徒溜出村外假充敌人包围进攻，向村内鸣枪。马刚听到枪声后，为保护首长和同志们安全，独自出屋察看敌情，被叛徒高俊清黑枪击中，当即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为了纪念这位不朽的战士，一九四九年三月，新城子中心区委在蒲河分区召开了马刚烈士追悼大会，当众处决了罪恶累累的叛徒高俊清，把马刚烈士的坟墓从二道沟迁移到烈士生前战斗的地方——刘千户村，并将刘千户村改为马刚村，村小学改为马刚小学。

七星山下的巨变

贾秀武

秋天，人们站在七星山上往南眺望，山下一片金黄色的稻穗随风摆动，如同滚滚的浪涛，十分喜人。此情此景，不禁使我联想起七星山下巨变的由来：多亏党的政策好，广大群众干劲高，引辽灌溉种水稻，产量一年更比一年高。

就从石佛寺灌区谈起吧！这个灌区位于新城子区西北部，包括石佛寺乡、兴隆台锡伯族镇、尹家乡大部分和青年农场的低洼易涝地区，总耕地面积为13.6万亩，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18.2%。该地区土壤为草甸土、沼泽土和部分风沙土。未开发水田之前，主要种植玉米、高粱、大豆和磨丝豆。平年亩产仅100—200公斤，如遇丰水年，地下水位高，七月份苞米和高粱杆水足涝死，矮庄稼水没顶，造成部分地块绝产，部分地区亩产仅十几公斤。群众称这个地区为“九河下稍，十年九涝”和“三白地区”（撂荒白茬地，盐碱地白，涨大水一片白）这“地广人稀”的贫困地区如不改变落后面貌，人们无法生存。

解放前，贫苦农民洪涝灾年逃荒，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过着乞讨生活，民不聊生，不堪列举。解放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做了国家主人。人民政府虽然采取一些有利措施，兴修河网化、修了防洪大堤，挖了部分排水沟道，但根治内涝仍没有彻底解决。遇着丰水年，农民辛苦劳动一年，到秋上仍收无几，还过着“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穿衣靠救济”

~ 7 ~

的贫困生活。

党和政府为了改变该地区贫困面貌，根据本地区土质、地下水位高、靠近辽河等自然情况，开始在种植品种上寻找摆脱贫困出路。区委、区政府组织区社干部、科技人员和群众，总结一九五六年青年农场17眼电井种水稻和一九六五年兴隆台用1眼电井试验种水稻的经验教训，同时，又学习了一九六六年市农委提出《沈阳市石佛寺地区治涝灌溉规划》中进一步论述引辽灌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区社领导和广大群众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引辽河水改茬种水稻是改变贫困的最有效措施。于是，在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区组织动员了2万大军，于1968年11月15日奔赴西北三社开始引辽工程大会战。

石佛寺灌区渠首设在七星山下石佛寺村北，引辽提水站站址在辽河南岸，七星山脚下坚实的岩石上。渠首由引辽引水段干渠和两座并列大型排灌站组成。第一期工程从1968年11月15日开工到1969年5月1日工程竣工送水，经过5个半月的日夜艰苦奋斗，修建渠首1座8个流量的提水站，修建干渠1条长达8.2公里，支渠5条长5公里，配套桥、涵、闸18座，共完成土石方46万立方米，使用人工25.2万个工日，达到了当年施工、当年引用辽河水试种水田两千亩的计划，1972年水田面积发展到1.55万亩，5年中除1972年受低温冷害影响，亩产水稻110公斤，相当于旱田产量外，其余4年亩产都超过200公斤，比旱田提高1倍多，为引用辽河水大面积发展水田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期工程从1973年11月开始到1975年7月，掀起开发水田大会战，区成立了西北水田会战指挥部，在市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由区组织动员了1.2万多民工、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1500余人，学生4000多人，共2万多人参加西北水田开发大会战。支援扩建续建灌溉工程，把干渠从中心台延长到九龙河并升为总干渠，又新修横干1条、南北盘古分干3条、支渠7条、在首渠增建8个流量补水站1座、配套新建干、支渠桥、涵、闸，二级提水站等工程76座，斗渠建筑物230座，共动用土石方217万立方米，用人工145.5万个工日，新开水田7.23亩，灌溉面积发展到8.76万亩，辽河到九龙河间低洼地基本改为水田。

1976年插秧以后，是围绕巩固已开发的水田面积，还是继续大干，向东部三台子一带高地和九龙河南开发到财落堡公社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当时采纳继续开发的意见。8月指挥部从兴隆台迁到尹家，开始进行第三期工程准备工作。10月末，组织西北三社和财落堡公社的力量，过九龙河干渠和三台子支渠，新民支渠土方工程先后开工，12月建筑物也开始备料施工。1977年1月工程全面铺开大干的困难问题逐渐暴露，致使调整加强了三台子站和新民支渠深挖方的施工力量，4月末，基本完成，正式通水试泵。过九龙河工程系统陆续停工，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灌区重点转入了巩固阶段，这个时期到1982年止完成渠首补水站机泵更换，拆出六台—28ZLB—70水泵，新安四台36ZLB—70水泵。为了加强总干渠的坚固，采取内坡砌石加固，外帮堤炕的办法，使输水工程设备安全得到保证。在导水路九龙河等主要排水干渠上新建了盘古闸，尹家闸，茨榆闸和翻身河闸，解决了排与灌的矛盾，又配套了六间房、河南、东拉拉、大黑、新民、石佛寺等中小型提站，达到了最大限度回收泄水，同时解决

了部分地块灌溉问题，还接长了总干渠两座渡槽，维修了十二家子倒虹等基础工程。

石佛寺灌区从1969年兴建，经过5年试验，2年大干会战开发和7年巩固三个阶段的建设，拥有工程设施主要有渠首2座中型提水站，装机容量2280瓩，提水能力18.6秒立米，设计灌溉水田12万亩，旱灌5万亩。

目前我区实灌水田面积1.04万亩，此外，还多次为新民县、于洪区供水，承担7千亩水田灌溉。灌区直接管理二级提水站13座1880瓩，乡村和农场自营二级提水站10座，535瓩，共有排灌设备4695瓩，育苗抗旱机电井506眼。总干渠1条长14.7公里，干渠、分干4条，长10.8公里，支渠17条，长48.2公里，干支渠桥、涵、闸158座，斗渠建筑物580座。

灌区排水系统的形成是随之灌区开发兴建灌溉工程的同时，对原有河网化，排水工程改善利用，增建排干、排支桥和倒虹工程，进行系统整治，已有4条21.3公里，排支20条，长78.2公里。按现有的排水能力基本达到市、区水利部门要求的“5年一遇”的排水标准，按“10年一遇”标准提高，主要是加深各级排水沟道。

十四年灌区工程建设共使用资金725.3万元，其中国家投资668.3万元，区财政自筹54万元，乡村自筹3万元。共完成土方44万立方米，石方6万立方米，使用人工214.9万个工日，大车241.9万台日。平均亩投资69.17元，用人工20.7个工日，大车23.3台日，土方42.7立米，石方0.85立米。

石佛寺灌区建成后，引辽灌溉开发水田，改变了生产条

件，给新城子区西北三乡（镇）一场人民带来了幸福，彻底改变了过去贫困面貌。

石佛寺低洼易涝地区开发水田震动很大，省内外朝鲜族先后有不少人要求落户，新建9个朝鲜族村，7个村有朝鲜族与汉族混居，当地农民过去逃荒走的也纷纷返回原村开发水田。

灌区建设初期，由于新修的工程配套不完善，灌区管理水平不高，当地农民习惯了旱田老祖宗种田法，朝鲜族用守旧的种水稻方法，他们对水稻新栽培技术没全面掌握。因此，开发水田头7年水稻单产仅2、3百公斤，但比旱田产量还提高1倍多，嚐到了种水稻的甜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了生机。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承包土地的积极性，推广农业机械化，实行科学种田。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推广使用化学肥料、用农药防治病虫害和药剂中耕除草等先进技术。灌区管理所提高了管理水平，实行单排单灌，坚持了支渠轮灌，按方分等收费制度。从而激发了农民种水田的积极性。灌区内开荒，扩边展沿增加水田1.1万亩。

几年来，石佛寺灌区水稻产量基本达到稳产增收，单产由300公斤增到450公斤，有不少村单产达500公斤到550公斤，有的地块单产可达600公斤。石佛寺乡1965年单产仅116公斤，1977年单产达285公斤，1987年单产达402公斤。鲁家村1987年单产达501公斤，1984年单产达550公斤。

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暖人心。人变、地变、环境变。昔日的涝洼塘，今日是鱼米乡。西北三乡（镇）一场开发水田以后，水稻产量基本达到稳产增收，农民的收入也随着

增加。留足三粮（口粮、种子、饲料）外，家家有余粮，如70%的户有存款。石佛寺乡人均收入从1966年的68元，1977年101元，1987年增到729元。石佛寺乡四龙村以前是西北有名的贫困村，近几年的收入不断增加，1970年人均收入10元，1978年166元，1987年达到738元。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改善了人们文化生活，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活环境大改观。农民吃的大米饭，穿的呢和料，住的砖瓦房。池塘养鱼吃方便，大部分村里有楼房，70%户有电视机，彩电每个村都有，农民过着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在党的十三大精神鼓舞下，认真贯彻执行十三大文件，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灌区继续发展。今后灌区以先进科学技术指导水稻生产，探索本灌区新的生产途径与农业新技术等措施密切结合，加速深化改革，把整个灌区水稻生产推向新的水平，成为生产优质大米的基地，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

新台子“清真寺”

周 绍 昌

站城子乡新台子村的“清真寺”，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它虽然经历了三次大变迁，至今仍为村内及周围村镇的广大回民——“伊斯兰教”教徒所瞩目。

清朝末期，这个村只有姓杨、马、王、黑等二十余户人家，人不足百口。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要求，凡有回族礼仪活动，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礼拜”、“沐浴”……。

到民国初期，由于这个村的回民逐渐增多，为了宗教活动的方便，于一九一二年，由本村回民老户杨德金主持，自筹资金，在自家商号院内盖了三间西厢房，成了本村最初的“清真寺”。当时只有两间“殿堂”（回民作礼拜和听阿訇讲课的地方），和一间“沐浴室”（回民净身的地方）。最初建立的“清真寺”，虽然地方小、设备不完善，但也请来了第一任郑“阿訇”（回族教长）。郑阿訇是河北省保定市人。他是由正规阿文学学校毕业的。他来到这个“清真寺”，热心为本村及外地的回民做了不少事情。从此，这个“清真寺”名声越来越大，参加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九一三年，由本村“德增厚”商号的掌柜杨德金主持，有石怀义参加，从本村回民中集资，并到沈阳、本溪、铁岭、开原、东丰、西丰及四平等地募捐。用筹划来的资金，在新台子村的东南街，买了一块树木环抱的向阳高地为房基，开始修建新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当年完工，